

# 从电子媒体到数码儒家

黄鸣奋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不论是19世纪兴起的模拟媒体,抑或是20世纪崛起的数码媒体,对于我国来说最初都是舶来品,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们使传统儒学深陷危机,又为其变革与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新世纪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数码儒家。

**关键词:**电子媒体;数码媒体;儒学;数码儒家

**中图分类号:**B262;G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4)01-0031-06

我们所说的电子媒体是19世纪以来先后两次信息革命的产物,包括电报、电话、传真、广播、电视以至于当今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电视、全球定位系统等。以电磁波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率先在欧美拉开序幕。这次信息革命既使传统儒学面临冲击,又为其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继之而起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以计算机发明为标志,爆发于20世纪中叶,如今仍在深入发展。它们不仅对推动西方社会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单单是说电子媒体种种日新月异的实际用途,而且是说它所代表的具有摧枯拉朽之力量的趋势:速度,光的速度,通过加快信息传递而加快社会运转的速度;连接,电路连接,通过各种设备的互通而打破各种社会樊篱的连接;技术,电信技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较量而体现综合国力的技术;共享,信息共享,通过公众参与而改变社会现状的民主进程……新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数码儒家。

## 一、电子媒体与儒家转型

电子媒体由西方人首创。电报19世纪30

年代出现于英美,初期普及较慢。清末民初著名报人蔡尔康谈到19世纪60年代初欧洲战事时还说:“盖是时尚无电报,军中消息罕得灵通也。”<sup>[1]</sup>不过,1871年电报水线就敷设到上海。清政府对电报存有戒心,曾限制上述水线登陆(结果无效),又否定了侨商王承荣自办电报的请示(1873年)。之后,某些有眼光的官员主张让电报为我所用,如福建巡抚丁日昌1875年兴办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附属于福建船政学堂),1877年在台湾设立电报局并敷设线路。在大陆,由于军事需要,清政府终于决定委托在华开设电报局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修建军用电报线路(1879年)。电话1875年由美国的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所发明。次年,波士顿和纽约之间的电话线路开通。1881年,英籍电气技师皮晓浦(J. D. Bishop)在上海实现一对露天电话之间的通讯。第二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扬于天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话局。19世纪90年代末,刚发明不久的无线电技术传入中国。1906年圣诞节前夜美国人费森登(Reginald Aubrey Fessenden)才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实验,1920年德、美、英、苏等国的电台才进

收稿日期:2013-12-28

作者简介:黄鸣奋,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赛伯文化和数码艺术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13BA008)

行广播,1923年上海就有了美国人奥斯邦(E. G. Osborn)创办的ECO广播电台。电子媒体在中国的最初应用与当时革故鼎新的社会变动几乎是同步的。如果说中国曾经以印刷术的发明惠及世界、推动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从西方输入中国的电子媒体所起的作用至少在下述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它不仅以前所未有的通信便利证明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且开辟了清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传播途径,从而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至于电视技术的应用,存在较大的时间差。英国广播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长期连续播放电视节目,美国无线电公司1939年就开始播送全电子式电视节目。相比之下,1958年我国才开始播送黑白电视节目。不过,我国电视台毕竟从一开始就是自主创办的,与电台的起步不同。在冷战条件下,电视作为最有影响的电子媒体强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性。以上所说的是基于模拟技术的电子媒体,简称模拟媒体。

电子媒体兴起和现代儒家转型究竟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或者存在某种因果联系,尚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儒家转型包括儒士转型与儒学转型,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而发生的。儒士转型意味着在身份上摆脱对封建王朝的依附、在思想上摆脱古代道统观念的羁绊;儒学转型意味着从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转变成现代社会理念的组成部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遇,内外矛盾加剧,洋务派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其自强运动(1861—1894)终归失败。1911年清王朝覆灭,1919年五四运动震撼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儒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冯友兰等人代表的新儒学亮相。它的目标是融汇中西文化,实现自我更新。

要论儒家转型和电子媒体兴起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清末“儒”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来华外国人亦可得而称之。例如,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电学考》一文谈到:“璞尔生者,丹国儒士,电报学堂之师也。近著《电学述略》一书以示学者,使知电之所以生之理,以广其用焉。”<sup>[2]</sup>文中提到的璞尔生(Care H. O. Poulson)是丹麦人,1900年在天津市

创办电铃公司,架设由租界通达塘沽和北塘的电话。该企业1905年为北京电报局所收购,我国从此才有了自主的电话事业。如果将璞尔生这样的人也当成儒士,那么,儒家队伍的扩大化和电子媒体的中国化作为历史进程明显有交叉之处。(2)在电子媒体普及化之前,人们经常将它当成某种身份象征。最先用上电话的是清朝皇室、政府官员,还有商界巨子、社会名流。身为儒士而对电子媒体加以排斥的人,即使有数量也很少。当时,有些人睁眼看世界,意识到了电信对于社会的重大影响。清末孙宝瑄就是其中之一。照他的看法,“西儒有言:汽蒸、邮电为万国开化根原,岂不然哉!岂不然哉!盖人之生也有智能,智能以交通互换而日增长。地之产也有货财,货财亦以流通灌输而益发达。当古圣人创舟车以济不通,其视未有舟车以前进化百倍矣。至今则以汽蒸速舟车之力,其视未有汽蒸以前进化万倍矣!何也?有汽蒸舟车则邮便愈捷,而人之著作思想印刷于报纸者,不数日而通遍远矣。商贾之往来愈多而各地之物产制造为人所必需者运输便利,更无滞积之虞矣。更有速于汽蒸者,不有电信乎!其通志意、传消息,俄顷而千万里如咫尺。盖人之能力至是,几与造化争衡神哉!其何术以致此也。欧西二百年来国运所以日兴。文化所以日进,皆因汽、电二学之发明而利用之。正如人之一身得是而血脉灵通,气机流畅,宜其康强壮盛、百病不侵也。”<sup>[3]</sup>孙宝瑄出身名门,虽然仕途不顺,但藏书万卷,有学问也有眼力。不过,像他这样关注电子媒体之作用的儒士并不多见。(3)与传统儒学偏重书本不同,新儒学重视大众媒体的作用。例如,1918年,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青年冯友兰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心声》杂志。他所撰写的发刊词抨击了北洋政府统一下的河南开封的一系列“老套”,包括当时河南图书馆的“陈陈相因,其中绝少近十年以内之出版物”<sup>[4]</sup>。从理论上说,新儒学不光可以在实践层面接纳并运用电子媒体,而且应当在学术层面阐释电子媒体的性质、功能、价值、影响等问题。不过,早期新儒家或忙于乡村建设(如梁漱溟),或忙于哲学思辨(如熊十力倡导“体用不二”,唐君毅探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关系等)。从总体上说,他们对作为新生事物的

电子媒体未能予以足够重视。

在中国,传统儒学的地位一度被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潮流所颠覆。新中国成立后,它经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对沉寂,到新时期出现了复兴的趋势,朝主张仁礼一体的大众儒学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这对新儒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正如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80年代所说,“十多年来,孔子频频出现在太平洋两岸的无线电波中,从新加坡到华盛顿的全美文理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sup>[5]</sup><sup>[227]</sup>有关学者已经指出下述现象:(1)东亚各国的电视规制模式,体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国家的影响<sup>[6]</sup>。(2)儒家思想在大众文化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础。例如,其价值观嵌入日本动漫以及《火影忍者》(Naruto)、《死神》(Bleach)之类电视动画中<sup>[7]</sup>。

## 二、数码媒体与儒家转型

基于数字电子计算机的数码媒体率先出现于西方,契机是二战期间取得突破的计算机技术到20世纪50年代转为民用。最初适应冷战需要而建设的网络到20世纪80年代扩展到商用,各国网络彼此互联互通,逐渐成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算机技术引领传统通信业、媒体业的升级改造,甚至为社会变革、国际关系调整推波助澜。中国传媒数字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码媒体日趋兴盛,不仅充当中国融入世界的促进者,而且也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受益者。

我国古代从总体来说很重视读书,尤其是儒家。它的命运是与“书”联系在一起的。进入数码时代之后,书籍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书正日益取代印版书。数码媒体具备如下特点:流动,可泛在接入,方便随时学习;漫游,可追随联想,进行网上冲浪;定制,可按需推送,实现阅读个性化;机辅,可人机协作,提高阅读效率。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从词语为主到多重代码、从有限知识到海量信息、从分门别类到混杂语境、从静态结构到流动媒体、从静观默察到交互界面的转变是严峻的挑战,不论对阅读速度、甄别能力、自主思维、历史意识等来说都是如此。为适

应上述挑战,数码时代的读书人必须提高跨学科素养、批判性素养、跨媒体素养、合作性素养。

事实上,新儒学如果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儒家传统发扬光大的话,不能不注意数码媒体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不能不正视传统儒家观念在某些方面与当今社会的差距。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两方面:

其一,传统儒家学说是否存在与数码媒体所代表的当代趋势不相适应的要素?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洪堡州立大学伯科韦(Mary I. Bockover)对儒家价值观和互联网的潜在冲突加以探讨,认为互联网是在自由表达、平等、自由贸易等西方价值观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将会给奉行儒家价值观的中国带来冲击<sup>[8]</sup>。当然,正如德莫伊(Marieke de Mooij)所说,对透明性、言论自由、新闻独立、真实公正的报道之类所谓共性,世界各国并不存在一致理解<sup>[9]</sup>。就此而言,互联网毕竟在中国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过,所碰到的某些问题也是西方人所难以想象的。例如,我国浙江工业大学林良华等人谈到:大学生网络痴迷的深层原因是儒家文化。据调查,浙江某大学189名退学学生中,有85%的人是因为迷恋网络而无法完成学业,上海某大学退学、试读、转学的205名学生中,有1/3的学生无法通过考试与无节制地上网有关。某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调查显示:因沉迷于网络游戏和网上聊天而退学的学生占总退学学生的98%以上。林良华等指出:儒家文化对大学生网络沉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这类学生有一共同点,即心灵底层内化了浓郁的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观,儒家的某些价值观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座右铭。表现为:过分崇尚理性、抑制情感;脱离现实,沉迷于网络虚幻的理想之中;“自我客体”式的人际关系网<sup>[10]</sup>。林良华等人的上述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因为迷恋互联网的现象不只是华族才有。不过,有一条是客观存在的:儒家所看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以实名具身交往为基础而建立的,与互联网所盛行的匿名去身交往氛围不相容。上述矛盾冲突及其所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例如,韩国汉阳大学Ook Lee等人曾经在英文刊物《赛伯心理与行为》上发表《克服政府赛伯空间中的儒家心理障

碍》一文,认为儒家传统仍然支配着东亚国家中许多人的行为。即使在电子邮件交流中,人们也尽力显示出为儒家传统所要求的尊重的迹象。这种心理障碍对于民主的发展是有害的,因为人们被教育成不要挑战长者或老板的意见。为了创造更为民主的社会,韩国实施电子政府项目,其特点之一是赋予公司在赛伯空间中表达诉求的场所。在首尔市政府网站公告牌上留言的人们不再使用电子邮件常见的表示尊敬的写法,克服了儒家心理障碍<sup>[11]</sup>。

其二,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学说,可否针对物欲横流之类消极现象发挥其醒世作用?不少人有这样的期盼。例如,高丽大学尹庆源(Kyongwon Yoon)《新儒家赛伯儿童的制造》一文中分析了关于手机的流行话语(1997—2002)对年青一代的描述,发现韩国普遍存在因卷入全球物质文化的焦虑,想要通过对主导性社会关系的再阐释来对抗上述趋势<sup>[12]</sup>。有鉴于此,以下问题是值得思考的:(1)传统儒家重视人格修养。孔子主张以仁德为本,朱熹进而主张作文与穷理结合。如今,由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影响,社会交往日益在虚拟条件下进行,社会角色、自我意识趋于多重化、流动化,用户行为具备不同程度的表演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儒家如何看待匿名制和实名制对人们心理的不同影响?如何看待人格修养的新要求?如何看待网络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区别与联系?(2)传统儒家认识到社会交往之重要,孔子主张教育的开放性,朱熹提出由吟哦讽咏达到读者与作者的心心相印。如今,以新媒体为平台的社会交往的范围已经超越民族、文化、国家的疆界,艺术领域分工合作已经发展到跨国规模,新媒体用户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新儒家如何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变化?(3)传统儒家重视群居生活的重要性,孔子肯定切磋琢磨的重要性,朱熹主张摆脱前代注疏者的限制、发挥书院的积极作用。他们都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出现。数码时代公众已经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被“儒者”启蒙的对象。更准确地说,由于高等教育逐步普及,公众的知识水准大大提高,“野人”(草根阶层)已经占据了压倒“君子”(传统文人)的优势。整个社会正朝人人皆“儒”(广义,指有知识者)的方向发展。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显得更为重要。人人皆儒可能意味着人人非“儒”(传统意义上的儒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儒家如何给自己定位?是继续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或者是作为普通社会成员参与无国界文化的建设?(4)传统儒家重视语言文字(特别是书本)作为交往手段的价值,孔子肯定审美特点对于媒体与艺术的重要性,朱熹看重文字对明道的功能。如今,电子读物已经成为书籍的新形态,互互联网已经成为电子读物传播的巨大平台,计算机语言已经成为人类的元语言。新儒家如何评价媒体技术在上述变革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5)传统儒家重视自己作为把关人的使命,孔子强调“思无邪”、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标准;朱熹肯定上述标准的作用,但反对将上述标准当成万用标签,主张对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如今,随着娱乐经济的日趋发达,“郑卫之音”已经成为艺术作品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新儒家是否认为“思无邪”的标准还能贯彻?若仍想把关,将如何进行?(6)传统儒家看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孔子提醒人们提防“巧言乱德”,朱熹主张文道合一。如今,数码媒体促进了艺术的泛化,许多作品已经和传统审美观念、道学观念无缘。新儒家如何看待上述倾向?怎样评价已经成为媒体习惯的炒作、“巧言令色”的广告?(7)传统儒家重视研究艺术作品影响人们的方式,孔子认为诗可兴观群怨,朱熹看重比兴。如今,交互已经成为新媒体艺术最重要的特性,新儒家如何把握人们在这种条件下的心理变化?(8)传统儒家重视媒体、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孔子主张学以致用,朱熹看重文随世变。如今,社会环境已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空前复杂,多元文化并存是不容否认的现实。新儒家如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出自己的声音?(9)传统儒家重视传统的地位,孔子倾向于复古,朱熹虽然看重远游深思,但也是引古代经典作为立论根据。他们都生活在前喻文化时代。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新儒家如何使自己与时俱进?

### 三、数码儒家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儒家”的概念已经变得十分宽泛。魏彩霞认为:“现代社会凡认同于儒家的心

性之学并积极探询其现代转化的学者就可称之为现代新儒家。”<sup>[13]</sup>一方面,儒学已经深深打上了现代化、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烙印。现代人的心理成为儒学不能不关注的课题,海外新儒家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数码媒体成为儒学传播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儒学的某些理念(如仁义礼智信)渗透到媒体从业者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进而成为了媒体诗学的研究对象<sup>[14]</sup>。当然,上述理念往往经过现代人的重新阐释。例如,戴木才提出了如下新解:仁是以人为本(仁爱、人道、和谐),义是公平正义(正气、平等、奉献),礼是德体法用(礼让、贵德、守法),智是智慧明辨(科学、求真、创新),信是诚信尽职(真诚、敬业、忠诚)<sup>[15]</sup>。杜维明归纳出21世纪儒学所面临的五大挑战,即何为人、人生的意义、如何知(认识论的问题)、如何行(伦理学的问题)、有什么希望(神学的问题)<sup>[16]</sup>。中国科学院郭沂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新的哲学,用新的哲学来激活儒家的核心价值,使其回到我们这个时代<sup>[17]</sup>。

新儒学可否有自己的2.0版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数码儒家”当成其人格化身。数码儒家不仅要掌握基本信息技能、具备跨媒体素养,而且要继承儒家的经世济民的人生理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发扬光大。大致而言,可以依与当前现实的关系将儒家的基本主张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确实已经成为“古董”,如井田、三纲、厚葬、繁饰礼乐、久丧伪哀、内诸夏而外夷狄等。第二类是和当下国情依然大致合拍,可以直接引用(或者重新阐释后加以引用)。例如,孔子说:“君子不器。”<sup>[18]</sup>真德秀引朱熹之释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sup>[19]</sup>我们完全可以从中领会到分科教育、专业教育的局限性,但不应因此像旧时道家那样轻视专门人才,要让人的潜能有条件根据自主选择获得全面发展。第三类可以作为警世格言来针砭时弊,如重义轻利虽然与商品化、市场经济等不合拍,但却有补弊救偏的作用。

事实上,新儒学如果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优良儒家传统发扬光大的话,不能不注意数码媒体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今,互联

网上和儒家、儒学、儒典相关的网页可谓比比皆是,“数字化文庙”之类项目也屡见报道。从数码儒家的角度看,面对数码媒体所提供的新机遇,以下问题是值得思考的:(1)应当继承传统儒家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抱负,充分利用数码媒体所提供的参与条件,激浊扬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应当重视虚拟条件下的自律。(2)应当继承传统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观念,同时明察其“华夷之辨”的局限,具备恢弘视野,洞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互博弈的大势。(3)应当肯定孔子打破过去统治阶级垄断教育局面的大无畏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而广之,同时要摆脱愚民哲学的消极影响,通过教育培养和激励公民的主人翁精神。(4)应当继承传统儒家重视读书、慎思明辨的传统,同时要摒弃他们轻视科学技术的陋习。(5)应当根据历史性和现代化相统一的原则,恰当评价传统儒家的核心范畴所曾起的作用,并对其中某些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范畴做出尽可能符合现代精神的诠释。这些范畴包括仁、义、礼、智、信,天命、良知、天理、心性、中庸、诚敬,四端、五常、五伦、七情、六欲、八德,忠恕、孝悌、廉耻、名节,道统、圣贤、君子、小人,经权、文质、礼乐,仁政、王道、礼制、教化、和谐,格物致知、内圣外王等。(6)应当肯定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合理性,亦应看到重官轻商、重本抑末已经与现代商品经济、文化产业等发展格格不入。(7)应当继承传统儒家兴观群怨、以文会友、微言大义、见贤思齐等主张,善于运用各种社会媒体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要充分发挥平等协商的优势,反对一言堂。(8)完全可以像传统儒家那样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但要破除迂儒所固守的“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sup>[20]</sup>,坚持与时俱进,善于博采众长。(9)既要肯定古代尊尊亲亲在传统社会中的某种合理性,又要正视信息社会后喻文化昌盛的特点,尊重年轻一代的自主选择,学习他们的长处,对其不足之处循循善诱。

总的来看,在智慧形成的过程中,媒体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没有语言,便没有人类特有的智慧,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哲人质疑书籍所能起的作用,例如,庄周假轮扁之口,对桓公读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

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sup>[21]</sup>尽管如此,儒家仍以书本为安身立命之地。在历史上,他们通过阅读书本而了解自己作为司仪应具备的知识,通过整理书本而确立自己作为文化传承人的地位,通过阐释书本而使自己获得教师的资格,通过将所专攻的书本抬举成经典而形成自己的权威,通过根据上述经典议论社会生活和时事使自己成为策略家、政治家,通过由上述经典提炼出来的标准衡量作品而使自己成为艺术评论家,通过将这一过程抽象化而使自己成为艺术理论家。儒家要在新世纪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不能不正视当前数码化的大趋势。这正是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媒体诗学、媒体美学的要旨之一。

#### 参考文献:

- [1] 蔡尔康. 泰西新史揽要:卷二·英国[M]. 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广学会刻本.
- [2] 陈忠倚. 清经世文三编:卷十二·学术十二[M]. 清光绪石印本.
- [3]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M]. 钞本.
- [4] 陶善耕. 也谈图书馆事业创新——从青年冯友兰“破老套”说起[J]. 重庆图情研究, 2006(2):13-17.
- [5] 德里克. 后革命氛围[M]. 王宁.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6] Ki-Sung Kwak. The context of the regulation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in East Asia [J]. Gazet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99 (3/4): 255-273.
- [7] CHRISTOPHER A B.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master: Confucian values in anime and manga [J]. ASIANetwork Exchange, 2010(2):39-53.
- [8] BOCKOVER M I. Confucian values and the Internet: A potential conflict[J].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3 (2):159-175.
- [9] DE MOOIJ M. Mass media, journalism, society, and culture[G]// Human and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round the Worl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309-353.
- [10] 林良华,严元. 大学生网络痴迷的儒家文化背景[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9(23):127-128.
- [11] Ook Lee, Sung Jin Gong. Overcoming the Confucian psychological barrier in government cyberspace[J].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2004(1):25-28.
- [12] Kyongwon Yoon. The making of Neo-Confucian cyberkids: Representations of young mobile phone users in South Korea[J]. New Media & Society, 2006(5):753-771.
- [13] 魏彩霞. 全球化时代中的儒学创新——杜维明的现代新儒学思想[D]. 杭州:浙江大学,2003.
- [14] 代雅静. 史量才广告经营的现实启示[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20):199-200.
- [15] 戴木才. “仁义礼智信”新解[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2(5):12-19.
- [16] 杜维明. 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J]. 探索与争鸣, 2011(10):3-8, (11):3-9.
- [17] 任蜜林. 2010年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综述[J]. 哲学动态, 2011(1):108.
- [18] 何晏. 论语注疏:卷一·为政第二[M]. 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
- [19] 真德秀. 读书记:卷二十九·孔门诸子之学[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 荀况. 荀子:卷五·王制篇第九[M]. 清抱经堂丛书本.
- [21] 庄周. 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M]. 四部丛刊景明世德堂刊本.

## From electronic media to digital Confucian

HUANG Mingf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hether it is the analog media emerging in the 19th century or the digital media sprouting up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had initially been imported novelties, but both had acted as an important stimulus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y have driven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to crisis, but have also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its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e New Century is calling for a new suitable digital Confucian.

**Key words:** electronic media; digital media; Confucianism; digital Confucian

(责任编辑:刘云)